促进商业银行转型成当务之急

随着监管层加大信贷紧缩力度，我国商业银行传统存贷业务的获利空间将逐渐缩小。从眼下银行业白热化的拉存吸储大战来看，银行经营模式已经到了非全面调整不可的阶段，要么转型，要么淘汰，已经成为我国银行业当前生存的关键。

马涛

市场环境倒逼转型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国内经济政策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经营模式已经难以应对当前复杂的市场变化，银行业无论是短期盈利能力还是中长期生存能力都面临严峻考验，规模扩张和吃利差的银行经营模式受到挑战，“贷长贷大”的信贷结构需要调整优化。从当前及今后所处的市场环境来看，我国银行业亟需加强自主管理，妥善应对以下变化：

第一，信贷调控不断趋向紧缩。信贷紧缩是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央行和银监会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双管齐下，管控信贷。央行重掌货币信贷总量调控权，并且在传统政策工具基础上，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动态调控信贷规模，而银监会则通过资本监管工具、日均存贷款上报、业务进入以及银信理财融资类业务入表等方式对银行经营严加控制。在如此严厉的调控环境下，“让信贷飞”将成为银行经营的历史。

第二，利率市场化需要加速推进。我国利率已经实现有限市场化，贷款利率在下限管理基础上实现“视风险定价”；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直接融资工具已实现利率市场化；在存款上，大额协议存款的利率也已隐形放开。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还差最后一步，即放开存款利率上限管制和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利率市场化不仅意味着商业银行将面临逆向选择、重定价、储蓄分流、债券资产缩水等诸多风险，而且意味着利差缩小。在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金融产品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对银行经营日益重要。

第三，资本约束更加趋于严格。《巴塞尔协议Ⅲ》已获通过并将逐步落地，根据协议规定，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从2%提高到7%，更加突出了风险敏感性资本要求和非风险敏感性杠杆率要求相结合。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限制商业银行风险资产的迅速扩张，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主要是贷款，所以一旦实施必然会大幅度地抑制信贷增长。资本约束不断强化将结束商业银行传统的以信贷快速扩张来抢占地盘的经营模式，要求商业银行改变经营理念与模式。

第四，金融“脱媒”态势日益凸现。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脱媒”趋势进一步加速。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加速对银行业渗透、资本市场对传统银行业的替代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减少，融资中介功能减弱，大量的优质客户离银行而去，利润空间不断缩小，生存发展日益艰难。直接融资规模及比重逐渐增加，将成为我国金融市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银行间接融资在整个社会融资体系中的占比，将从现在的80%左右下降到50%左右。

加快战略转型步伐

为促进我国银行业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服务功能，加快推进商业银行战略转型，转变传统的以规模求发展的盈利模式，建立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资本节约型发展模式，成为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首先，商业银行应加强对经济金融形势的研判，合理安排资金配置与使用，注意监控流动性风险，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科学匹配资产负债的期限结构，在利息上升的预期中缩短贷款重定价周期，控制利率波动带来的各种市场风险，减小宏观调控对银行经营的冲击。

其次，依赖存贷差模式的高增长带来的是高资本消耗，加快从资本消耗型业务向资本节约型业务转变，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创新金融服务能力将超越传统资金实力，成为商业银行新的竞争优势。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金融创新，深化与信托、基金等同业的合作创新，适度提高杠杆比率，加大不占用或少占用资本的中间业务在盈利中的比例，包括中间服务业务、委托代理业务、资产管理业务等。

再次，我国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调整客户结构和业务结构，主动转变利润增长方式，实行更精细化的经济资本管理。从重批发、重公司业务转向批发和零售共同发展，尽快结束“垒大户”的传统模式，降低风险集中度。从高碳金融发展转变为低碳金融发展模式，从着力支持项目扩张尤其是房地产信贷项目扩张的投资金融转变为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实现业务经营从“红海战略”转向“蓝海战略”，加快各维度的资源整合，尽可能以最小的资本消耗获取最大的经营效益。

最后，加快由传统的融资中介向财富管理银行的战略转型，发展以私人银行为核心的高端业务，加速建立高端客户服务理财中心，集中为高端客户提供各种个性化、高附加值的财富管理服务，提高高端客户的贡献度。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焦点评论

贫困县热卖图纸房折射出什么

冯海宁

据报道，开发商只要拍下一块土地，印出简单的户型图就能吸引大批购房者，收到预售款后再开工建设，这就是国家级贫困县光山县的房地产开发模式。

对于一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98元，公务员、教师等月收入只有1600元左右的国家级贫困县，房价已经涨到3000多元/平方米，而且倒卖购房指标就能轻松赚钱，简单的户型图就能吸引大批购房者，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楼市病得不轻。

贫困县热卖图纸房的深层问题在于楼市病入膏肓。当一线城市高房价把一部分购买力逼到二三线城市，二三线城市高房价再把购买力逼到小县城。在我看来，一个贫困县热卖图纸房折射出了大城市的楼市“病情”，甚至折射出整个中国楼市已处于危险的边缘。如果楼市泡沫一旦破裂，受冲击的不仅是一线城市，说不定对贫困县影响最大。因为一线城市聚集了太多的公共资源还能多少吸引到购买力，而贫困县则可能要变成烂尾楼的“展览馆”。

从今年初出台的“国八条”来看，决策层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楼市“癌细胞”不断在扩散，因而，提出把建制镇也纳入住房保障工作范围，并要求扩大“限购令”实施范围。但仅靠“国八条”能否阻止“癌细胞”扩散还需要观察，我对此不太乐观。

一方面，这几年楼市调控几乎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除了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其他时间都在遏制房价上涨，但楼市泡沫依然不断在扩大。即便是去年实施了“史上最严”的调控，“癌变”照旧。这就让人对“国八条”效果产生担忧，而且，贫困县热卖图纸房就发生在“国八条”出台之后。

另一方面，“国八条”依然没有触及楼市深层问题。有业内人士建议，应进行制度性调控，包括及时反映市场需求变化的土地市场制度，让企业自我承担风险的房地产金融制度，能自动调节住房资源占有和收益分配的房地产税收制度等。但“国八条”与这样的建言还有一定距离。

在笔者看来，楼市调控最终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根治，例如，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来纠正土地财政，打破行业垄断以避免资金炒房，真正改变公务员福利性住房现象，让公务员进入房地产市场购房，才能避免“局外人”决策楼市。遗憾的是，体制改革暂时在“国X条”中还看不到。

老牛跨栏

春季攻势实在牛，沪指收复两千九。
多头昂扬有依据，空方勉强找理由。
经济回暖可判定，股市背离将罢休。
眼下机会胜风险，掘金寻宝是时候。

王志成/画 孙勇/诗

公募跟私募 比谁更给力

黄湘源

“公募不作为，私募更给力”，如果只是一种过去式，显然并不足以充分反映当前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就其对基金市场表现的促进作用来说，对于未来基金市场发展的市场化趋势，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过去一年，公募基金发行的新基金尽管仍有145只，并募集了2351亿份，但基金的份额总体上却出现下降，不仅比2009年年末的2.4535万亿份减少了302亿份，而且比巅峰时期的3.3亿万份更是下降了26.56%之多。与此同时，各类形式的私募基金却蓬勃发展。有关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阳光私募信托累计发行产品达1592只，2010年度新增产品647只。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累计发行规模达1206亿，当前规模约为1399亿，存续产品当前规模近1198亿，规模较之2009年年底翻了一番。

公募基金江湖地位的江河日下，是公募基金长期以来习惯于躺在政策扶植的温床上“等、靠、要”，不思改革创新，不作为，不进取的结果。本该以“专家理财”为立身之本的公募基金，不仅只知“靠天吃饭”，而且，还把“市场稳定器”的历史使命当做黄袍加身的护身符，争先恐后地争排名、上规模，在基金名称上变着法子发行新基金，以此换取可观的无风险管理费收入，却把提高投资业绩，做好客户服务当做可有可无的分外事。公募基金在借助体制性的优惠照顾取得了得天独厚的垄断性市场资源配置优势的同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基金管理费向上，投资收益向下”的基本特征，反而使得“排名战’你死我活，‘跳槽经理’越来越多”。这充分说明，基金发行体制向公募基金一边倒的“政策市”和国有金融公司对基金公司的过度垄断，不仅不能体现基金市场的充分竞争，而且，现行基金管理制度下的价格垄断、权利和责任不对称、收益与风险不对称等弊端反而越来越放大，最终势必养虎贻患，成为捧着咬手甩了可惜的一大祸害。

尽管基金立法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但是，阳光私募的崛起显然是我国资本市场逐步走向市场化的题中应有之义。2010年，沪深300下跌12.51%，而基金公司专户“一对多”产品平均收益率和阳光私募平均收益率分别高达7.49%和6.4%，券商集合理财为3.07%，公募偏股型基金为3.01%。对于投资者尤其是高端客户的理财需求日益“觉醒”的中国资本市场来说，私募基金和私募理财产品目前的业绩表现比公募基金更给力，这已经是没有疑义的现实。

私募基金及相应的私募理财产品之所以更能博得投资者青睐，除了它们在中小盘股票估值的选择倾向上比公募基金更贴近市场的脉搏之外，还跟其不会像公募基金那样牺牲基金持有人和投资者的整体利益，不惜一切代价为“三高”新股的发行充当垫脚石分不开的。这充分说明，如果说公募基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沦落为政策市的调控工具，那么，私募基金以及相应的私募理财产品才有可能在满足市场对投资理财产品需要的同时，更好地体现投资工具和盈利方式在市场意义上的本质属性。

严格地说来，在基金体制上，只有是不是更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区别，没有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何种体制更好之分。我们主张改变公募基金“一基独大”的局面，还给阳光私募基金合法生存的市场地位，更重要的是，要以市场化、法治化为方向，以发行体制、公司治理机制为突破口，大刀阔斧地推行基金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 储心积虑 | Chu Zhusheng´s Column

中国城市化之忧与思

储著胜

中国城市化标准何在

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式启动。农民进了城并不等于就是城市化，只有等他们变成了城市居民，城市化才算真正完成。因此，就我国而言，真正的城市化至少包含以下四条标准：

一、工作在城市。农民离土不离乡不是城市化，只有他们离开农村，走入城市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城市化才算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先后进入城市从事各种工作，他们被统称为“打工一族”或“农民工”。农民进城迈开了城市化的第一步。

二、在城市安居。即拥有独立且固定的住房，或买或租。安居乐业是人生的起码要求，有了独立且固定的住房才能成为城市居民，否则都是居无定所人员，即使有暂时的栖身之地也谈不上是城市居民。

三、拥有城市户籍。户籍在中国的重要性大家都很明白，因为它和医疗、保险、教育等各种福利待遇高度相关。一个在城市工作、拥有固定住房的人，如果他不拥有所在城市户籍，那么他仍然是个边缘人，因为他享受不到这个城市居民所应该享受到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待遇。现在人们之所以说我国的城市化是不彻底的、残缺的城市化，就是因为为数众多的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作的人，他们一无住房、二无户籍，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因此，这样的城市化是非常不完整的。

四、家庭在城市。一个人如果他在城市工作，在城市也有自己独立且固定的住房，同时还拥有城市户籍，但是他的老婆、孩子仍然生活在农村，那么这种城市化仍然是不彻底的。只有一家人能长久团聚在一起，共同工作、学习和生活在城市，这样的城市化才是我们最终期盼的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现存之忧

中国城市化现存的问题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住房需求急剧上升，在国家保障性住房供给严重缺乏、买卖土地成为政府重要财源的形势下，城市住房价格便一路扶摇直上，使众多想买房者只能望房兴叹。我们不能说城市化必然导致房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但是在中国目前这种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构架下，房地产行业脱离正常发展轨道呈现一片乱象可以说确实有一定的必然性。

二、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由于我国城市化并非真正的城市化，它不是一个系统的推进过程，而是采取劳动力转移先行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等一系列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短缺。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性，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这方面所付出的社会有形和无形成本都极为巨大。

三、农业耕地被无序侵占。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城市规模的扩大是以土地占用为前提的。一些当政者出于政绩考虑，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做出种种超越法律法规的事情，最典型的除了强制拆迁外，就是对农业耕地的非法占用。我国虽然有所谓的18亿亩耕地红线作为底线在坚守，但实际上现有耕地究竟还剩多少谁也搞不清楚。耕地面积不能保证，我国粮食供应也就必然存在隐忧。

四、城市病日益加剧。农村人口大量向热点城市转移，使这些城市实际容纳的人口远远超过其能够容纳的人口，于是便导致一系列问题，如交通难、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等等。城市病的加剧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居民的幸福感受，带来了很多负面后果。

五、农村衰败。随着大量青壮劳动力走向城市，许多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结果不仅农田荒废，原有的家庭养猪、养鸡等事业全面消失，而且留守儿童也得不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老人的抚养更是落空。农村生活因为中坚力量的离开而缺乏应有的气息，给人以强烈的衰败感觉。

中国城市化未来之思

近两年多次出现“用工荒”，实际上这种现象已向我们表明：劳动力单兵突进式的城市化已难以为继，彻底的城市化成为人们共同的期盼。而要想使城市化走向彻底和完整，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必不可少：

一、大力推进保障房建设。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绝大多数收入有限、购买能力弱，想他们都能通过购买商品房以解决自身居住问题是很不现实的。根本的途径是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下，大力进行保障房建设。可以说，没有足够的保障房供应，所谓的城市化必然是不完整的。因此，要实现真正的城市化，政府必须首先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商品房的调控虽有必要，但不是主要的，这方面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尽量把地价降低。否则都是舍本逐末。

二、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我国政府是个非常富有的政府，因为每年的财政收入都极为可观，但问题是财政资金用于生产建设和行政事务的过多，而用于民生福利的过少。针对这一问题，把更多财政资金转向民生，增加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就成了急迫之举。目前通过严格控制户籍的方式来应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严重短缺是一种非常消极的、无奈的方式，需要尽快加以改变。

三、城市发展要整体规划、有序进行。我国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差异化严重不足，高度的同质化一方面使各自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吸引和稳定相关人员。一个城市在规划发展时一定要先找到自身的特点，然后再据此进行功能定位，如此，不仅能大大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而且还能吸引到相应的人员，这些人员一旦进来后就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不会轻易地向其它城市进行流动。人员稳定了，他们就会有长期的考虑，住房、户籍等问题也就成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城市发展能够根据规划有序进行，还能使非法侵占农业耕地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

四、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员的流向。我国农业人口在向城市转移时完全是依靠个人的感觉，政府在这方面的引导作用严重不足。实际上，我国经济发展是有整体布局的，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布局，就需要为其匹配相应的人员，因此，对农业人口流向城市就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指引方略。这对于农业转移人员本人、吸纳这些人员的城市和相关企业都是有好处的。就转移人员过多的农村来说，实行集镇化，将留守人口适当集中是可行方式。与此相配套的是要解决好农村宅基地自由有偿转让问题。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